

杨伟名经济思想初探

韦苇

(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西安 710069)

摘要: 杨伟名是陕西省户县的一位伟大的农民思想家。本文从五个方面分析了他的经济思想,作为对他逝世 35 周年的纪念。

关键词: 杨伟名 经济思想 农村

中图分类号: F0; K0 **文献标识码:** E

1 引言

杨伟名,陕西户县人(1922-1968),一位伟大的农民思想家。在中国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用他的实践与思考,用他的思想与生命,在探索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指导理论与路径选择这样一个严肃的历史命题上,付出了几尽毁家纾难的代价,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一个普通中国共产党员本不应承担的历史责任,本不该付出的沉重代价。然而他承担了这种本只应由治国安排者承担的道义,因此他“人如其名”,也就成为名重青史的伟人,历史不应忘记他,也不会忘记他,这是历尽艰难的中国应给他的回酬,这是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者和思考者,作为后来人对历史先哲应尽的一份孝道。笔者作为杨伟名先辈故乡的一名学子,在对文革的记忆中,就知道其人其事。通过对全德普大作《乡村哲人》的再三拜读,更对杨伟名先辈的事迹与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把握和理解,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与神往,作为一名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专业学者,写一篇学习和评介杨伟名先辈经济思想的学术论文以告慰忠魂,成为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成为我几年来魂牵梦绕的情结。我仿佛看见冥想中杨伟名先辈殷切的目光……

然而几年来未敢造次下笔,总怕自己的才疏学浅,诉诸文字的东西不能确切反映先辈当年崭露头角的思想锋芒,反而影响他的形象。2002 年秋,家乡户县党政各界及诸时贤名流,筹划许久,拟为杨伟名先辈举行其诞辰 80 周年暨代表作《当前形势怀感》问世 40 周年纪念活动。相邀我撰文参加活动,我便再无犹豫的理由,不揣冒昧,谨以下文作为心香一瓣,祭告杨伟名先辈的在天之灵。

2 杨伟名经济遗著及其学养基础概说

杨伟名在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 3~4 年里,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名义,独立署名或联合贾生才等其他党员干部上书上级党政机构领导,反映当时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农村面临社会经济困难乃至危机的形势,并有自己深刻的思想见解与政策建议,先后有三十余篇,但绝大多数已轶散毁亡,不可详考,根据全德普先生的《乡村哲人》所载,现在保存下来的尚有: 1.《畅谈小麦播种问题》(1960 年 9 月); 2.《有关处理目前物资供应困难的建议》(1961 年某月); 3.《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对六十条修正草案的修正意见》(1961 年 10 月 21 日) 4.《谈关于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1962 年春) 5.《目前农村工作十谈》(1962 年春); 6.《建议——学后感与单式记帐法》(1961 年冬) 7.《当前形势怀感》也叫《一叶知秋》、《三个党员的来信》或《万言书》(1962 年 5 月)。共 7 篇。笔者未见 7 篇原件全文,

本文所作的评析，仅能以全德普的《乡村哲人》中的引文作为基本素材，特向全先生致谢。

从全德普著所引杨伟名上述七篇著作的部分论述和全先生对原文的背景分析与评价中，我们已经能初步了解杨伟名经济思想的基本轮廓以及这些宝贵思想所依以产生的哲学基础和杨伟名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使人不能不惊叹，作为周秦汉唐四大盛世故地的关中平原腹地的户县藏龙卧虎，有深不可测的文化底蕴，只有这样的文化积淀，才能孕育产生杨伟名这样的农民思想家——“乡村哲人”，反过来杨伟名的出现又是孕育了这一伟人的皇天后土——户县的骄傲！

杨伟名对 20 世纪中期中国农村问题的深邃思考与敏锐的先觉，首先源自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掌握。这位先哲几乎是无师自通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武器，能够娴熟地运用矛盾论与辩证法分析当时农村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大至生产关系与经济体制调整的“进与退”、“计划与市场”，小至小麦播种的“合理密植”，无不体现了辩证思维的特点。杨伟名的第二个思想武器是“历史唯物主义”——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他的多种建议与改革方案，大至建议调整人民公社的分配单位——以队为基础，小至对会计制度“复式记账”法的坚持和对所谓新法——“单式记账法”的反对，皆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依据，反对长官意志，反对瞎指挥，不唯文件、不唯上，只唯真理，而这“真理”又以社会实践——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检验的标准。这种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既是一种方法论，又是一种世界观（即今天所该谓的价值理念）。这是杨伟名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精神力量的来源。

杨伟名的出现，应该说是历史的召唤。当时中国社会历史的车头已偏离了正确轨道，而驾驶者尚浑然不觉，或虽有觉察尚觉无妨大局。需要有人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令其转轨变型，但“挺身而出者”不仅必须有胆，而且还必须有“识”。这种“识”就是知识、学识、见识，就是本人的文化素养与道德水平，而杨伟名正具备了这样的素质条件。第一，天资聪颖的杨伟名虽然只读过几年私塾后，就因家贫辍学，但凭天赋与勤奋自学完成小学、初中、中专的课程，其实际文化程度达中专——高中毕业水平。所以他的好友谢志安（原户县文化馆馆长）说：“我是什么学历，他就是什么学历”。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农村少有的“文化人”。第二，少年的“私塾”教育、为杨伟名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使他具备了著文立论的文字功力——使得我们四十年后拜读其遗著，不只仅仅为文章思想的深邃而折服，而且为其犀利的笔锋，明快的语言，带有受过国学训练的人特有的“古雅”文风和文中左右逢源，拈之即来的历史典故所震惊。第三，传统文化不仅给予了杨伟名驾驭文字的功力，而且给予了他“精忠报国”的情怀与“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历史责任感。这正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为国捐躯、为民请命的精神支柱，亦是杨伟名屡屡上书、执着无悔的动力源泉。第四，杨伟名长期担任大队文书，又是经历过时代考验，两度入党的共产党员，中共对党员干部长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他本人所具有的工作职务之便，可以阅读党内文件及其勤奋善思的特点，使他对当时党在农村工作的政策得失烂熟于胸。并能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作以剖析，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践的基本素材进行见微知著、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升华。笔下之文既是切中时弊的手术刀，又闪烁着理论真理的光辉，带有思想先驱的性质。使他当之无愧地在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又可以说是历史造就了杨伟名。杨伟名的出现，“当前形势怀感”的产生，正是历史与杨伟名互相选择的结果。

3 杨伟名经济思想分析

从全德普著所引杨伟名仅存的几篇文章的引文看，我们可以认为，杨伟名在当时不仅是无师自通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几个基

本理论或经济规律问题，都有独到的理解，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的提法具有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综合理解，并可以视为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渊源。

2.1 关于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认识——对“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调整的见解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规律，即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结构形式。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且反作用于生产力。两者适应，生产关系则促进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滞后或超前，均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是一般的经济学原理，是任何一个稍有经济学知识的人首先必须牢记于胸的第一定律。但对这一规律的深刻理解与顺应，中国共产党人却在建国之后的经济建设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主要领导人，过于强调先进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正面促进作用，误以为生产关系的人为提升，可以带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系列的决策失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左倾路线的产物。错误的思想体系、错误的政策决策，错误的体制安排，对生产力带来了极大破坏。这反而验证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规律并蒂而生的另一规律的巨大作用：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而且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一旦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的思想意识形态出了问题，必然反作用于生产关系，导致制度选择和运行体制脱离正常的历史轨道，继之而来的是生产力这列时代列车的脱轨与倾覆。这就是继1958年三面红旗后的三年“自然灾害”背后的真正的“人祸”原因。——这是40年后我们这一代人对历史经验与教训清醒认识后的理性总结。然而当年的杨伟名，他以惊人的颖悟能力和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已经运用了这一规律向上级党政领导作泣血式的反复诉求了。在1961年初写的《有关处理目前物资供应困难的建议》一文中，杨伟名分析了当时物资匮乏，而“分配”不公问题成为加剧这一问题恶化的主要原因。他援引辽沈战役攻打锦州抓主要矛盾和中国古代军事战略思想中的“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的例子，说明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和自然灾害严重的条件下，分配制度作为生产关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调整使之适应的道理。他指出：“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能够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而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的“定量供应”制，实际是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使男劳动力吃不饱，重活、累活没人愿意干，而按人头分配口粮的“定量供应”除了刺激人口增长之外，再无刺激生产力增长的其他积极意义。他认为只有改变了农村口粮分配的平均主义倾向，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才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从而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增加农副产品的产量。同时将必然从根本上缓解城市物资供应匮乏的问题。而农村分配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涉及农村整体经济体制的调整，杨伟名的此篇文章和另一篇《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对六十条修正草案的修正意见》中均以对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水平规律的深刻认识为依据，反复强调要下放人民公社的管理权限，把生产经营管理的决策权，收入分配决策权下放到生产队。后来在中共中央颁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等文件中，均提出了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防止平均主义倾向等原则，并最终确定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一基本的人民公社所有制结构框架。这一所有制结构模式一直运行到80年代初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代替，应该说这一体制虽然没有彻底解决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水平问题，但毕竟较之“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人为拔高公有制程度的做法，是一个“退”步，它对于中国农村六七十年代生产力的缓慢恢复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杨伟

名的建议竟然在党中央的“调整”之前就已经反复上达了，应该说党中央后续文件的相继出台，也是汲取了来自像杨伟名这样基层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养料的。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杨伟名在为《建议》一文的写作做准备的过程中，他记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在总题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认识和感想——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文章中，有一段题为《粮食不宽展、饭还要吃》的文字，其中谈道：“吃饭，除有生活的意义外，并含有生产投资的性质。”因此，他认为为了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就必须解决劳动力的吃饭问题。他认为：“不合理紧缩必要的生活资料 and 资金匮乏问题是形式上的统一，实质上的矛盾。另一方面，粮食不宽展和饭还要吃，是形式上的矛盾，实质上的统一。”这段文字不但又一次展现了杨伟名思想方法上的辩证思维特点，而且关于生产劳动者的生活消费是生产投资的一部分的观点，是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深刻理解！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特点时深刻指出，工人的生活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在资本家眼里是生产性投资。剔除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背景之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对任何社会化大生产均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包括这一条关于工人——生产劳动者个人消费是社会化大生产必要条件是生产性投资的重要原理——仅此又见杨伟名经济思想的闪光之处。

2.2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等思路的初创者——关于“分田到户、恢复单干”的设想与论证

杨伟名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是忠于共产主义理念的，他是想坚持和维护人民公社这种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的。但他看到了这样“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助长了绝对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的懒汉风气，因此，他不仅提出了上述的调整生产经营决策管理与分配关系——以队为基础的方案，而且在《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对六十条修正草案的修正意见》和《目前农村工作十论》中还理想主义地提出通过利益机制和道德教育双管齐下，把社员固有的爱家思想提高到爱集体的新高度，赋予生产队以家的形态：“这个家是在原来一家一户的基础上，加以适当扩大，在性质上比原来无比优越的家。”但实践证明这一调整方案并不是适应生产力水平的最佳方案，“爱社如家”、“爱队如家”，仍然仅仅是贴在墙上的标语口号。现实中社员的自留地的单产已经超过了生产队大田产量的一倍以上，乃至几分地的收获竟成为一个几口家庭的口粮的主要支柱，同一块天下的同一样地，为何产量差距如此之大？仍然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水平！杨伟名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愈来愈透彻，愈来愈接近真理了，终于《当前形势怀感》喷薄而出，这是多少年在实践中痛苦思考的后积薄发啊！

在《当前形势怀感》中，他建议党中央拿出当年《撤退延安》的勇气和战略眼光调整生产关系，“农业方面争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他认为“几年来，我们是朝着退的方向做的，并且收到效果。不过还未到家，应进一步就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方针作全面彻底的调整！直到困难克服而止”。他公开主张“恢复单干”并作了专题论述（为全文的第六个专题），他指出“目前有不少的人在认识上觉得现在再要恢复单干，就不必恢复合作化前那种单干，而是以新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单干形式出现。这种单干，其所以有别于合作化前的那种单干，正是因为：土地虽分到户，而地权仍归集体所有，牲口农具可以私有，但不能买卖，也不能出租，劳动致富，生产发家，剥削行为不能有。”“新的单干形式，既能适应当前客观形势，又符合按劳分配杜绝剥削的社会主义原则，堵塞了农村阶级的两极分化。”他还提出了“分田到户，不是要求一律单干，而是愿意单干者，可以允许，愿集体者可另行自愿结合，这样集体与单干两种形式，同时并存，估计这样因皆出于个人自愿意，生产是会搞好的。”他认为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机械化生产条件远未成熟），社员集体观念太差，农村基层干部素质太低，不具备领导大生产的能力，因此，生产队集体生产效率低，只有上述条件转化了，具备了，“然后根据群众自愿，因势利导的

朝着集体促进。”

杨伟名这个有别于合作化前的单干方案即“分田到户”方案让我们想到了 15 年后产生于安徽凤阳小陈庄的“包产到户”方案。那张按着十几位农户红手印的秘密承包合同书上写着农民为了换得对土地经营自主权而甘愿付出身家性命的承诺，然后历史不会再让他们付出这样的代价，他们欢天喜地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那张纸作为中国经济改革伊始的宣言书放进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而早于他们 15 年的杨伟名呈上的是具有理论价值与可操作性的“万言书”，换来的是家破人亡！因为有杨伟名之死，才有小陈庄农民的成功，杨伟名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驱者与捐躯者的历史地位，是应该著入中国现代经济改革史的。

杨伟名的改革方案还使我们想到了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思想。小陈庄岗村农民的改革之举，并没有自己的理论准备。他们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渴望对土地当家作主的感性认识。而正是邓小平发现了这一事件蕴藏的历史意义与历史契机，他以此为突破口发动了史无前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且农业改革率先成功。邓小平的农业改革思想体现了深邃的战略目光。要言之，他认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要一靠改革、二靠科学，在体制上要分两步走，实现两个飞跃。第一步，主要靠政策，适应 80 年代生产力水平，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调动农民积极性，脱贫困、达温饱、奔小康；第二步，主要靠科学，依靠科技进步和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带动作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生产水平，在新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和群众自愿的原则下，探索农业集体化、生产社会化的新形式（邓小平指出不是原来人民公社的复归），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第二个飞跃——即我们今天说的农业产业化（详见拙著《走向富强的千年追求》第二章有关邓小平经济思想）。比照邓小平农业经济改革思想，杨伟名的方案与之何其相似也！他已经提出了“分田到户”和“地权仍归集体所有”（所有权）的两权分离的方案，并指出将来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干部群众素质与觉悟的提高，农业经济形式还会“因势利导”，向前再迈出新的一步——虽然他还提不出“农业产业化”新概念，同邓小平一样认为“朝着集体促进”，但这个“集体”亦绝不是对人民公社的简单复归。从这种意义上讲，邓小平与杨伟名，一个是中共第二代伟大领袖，中国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一个是普通党员，难道不可以认为领袖的智慧是全党智慧的凝聚，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也吸纳了不仅包括小陈庄村农民也包括杨伟名这样为党为国为真理付出生命的乡村哲人的思想智慧吗？

2.3 关于市场机制、价值规律与计划体制的认识

关于对市场机制与价值规律的认识与反复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所经历的思想历程。首先毛泽东同志本人曾有过对价值规律的正确认识，认为“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每个党员干部都应该到这个学校学一学，而且主张恢复农村农副产品市场，以解决人民公社的困难（详见拙著《走向富强的千年追求》第四章有关毛泽东经济思想部分）但毛泽东同志后来又放弃了这些正确认识转而批判孙治方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规律”的观点。因此，对善于读书，博闻强记的杨伟名来讲，认识市场机制，懂得价值规律就不足为怪了。在《有关处理目前物资供应困难的建议》一文中，他不仅提出前述的坚持“按劳分配”原则问题，而且已接触到通过调动农民积极性增加农副产品市场供应问题，并在“效果的预见”一节中提出了“竞争”机制问题，认为“我们国家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尽快建设具有现代工业、农业、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经过一个自由竞争的时期。目前，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也正是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掀起一个自由竞争的高潮”。虽然，这里的自由竞争还不是专指市场机制的构成要素之间的市场竞争，并把它和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作了区别，但在当时，自由竞争作为与计划经济体制根本对立的资本主义经济范畴，谈到它就意味着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是市场经济的代名词，自由竞争必然与市场连在一起。杨伟名在

当时党内反三自一包的风头上，提出了这一敏感问题，所冒的政治风险是可想而知的。

杨伟名谈价值规律的第二篇文章是《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对六十条修正案的修正意见》（1961年10月21日），他提出，要想促进生产队服从国家计划，除了合理的布置生产任务（即下达计划指标）外国家更重要的手段是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用高出一般水平的实惠，鼓励生产国家最迫切需要的东西”。——这是运用价值与价格的背离来刺激生产队实现国家的计划意图，用经济手段实现计划指标，真是对价值规律反弹琵琶的绝妙思维。

杨伟名大量谈市场与价值、价格问题，是《谈关于一类物资开放问题》一文，所谓的一类物资即“粮、棉、油、肉”，由国家统购、统销，垄断经营，计划供应，任何个人（尤指农民）买卖这几种生活必需品，都是非法行为。而且国家的垄断与计划供给窒息了农民生产这些农副产品的积极性与其流通渠道，更加造成了供应的短缺，而愈短缺，国家愈要控制，形成了恶性萎缩的怪圈，杨伟名以他一以贯之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指出开放一类物资，允许其上市流通，对于解决国家供应困难与群众生活困难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他首先分析了出现这种经济困难的政策性原因，指出“开发一类物资自由市场，促进余缺互补”是“绝好的协作互助”，接着阐述了运用市场机制调节生产与流通的具体做法：一是主张运用市场机制调节和刺激生产，并以棉花的计划收购价格与红芋的市场价格（红芋当时不属一类物资，国家未严格控制，故能流入自由市场）相比较，指出每亩红芋（红薯）的经济收益可抵棉花60亩的收益，农民怎么会有种棉与卖棉（给国家）的积极性呢？因此，他主张棉花与棉布国家均不实行计划价格和统购、统销，让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形成合理比价，刺激棉花与棉布生产购销两旺的良性循环；二是分析政策行为对市场的影响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他以小麦黑市价格随国家的严格控制而上涨并非下降为例证明，“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因货畅其源，粮、棉、油价格将急剧回落，更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对农产品生产者的刺激，农产品数量将迅速增加，这样从总的趋势看来，三数年后，自由市场价格与国家牌价（计划）价格将会达到平衡或接近平衡了，当农产品进一步继续增加，情况将会翻倒过来，形成产品的滞销现象，到了那时，我们国家的农产品收购，也就由原来的满足国家需要的性质而变成为照顾农民利益的一项经济措施了，关于这一点，倒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而是十分现实的看法。”从这段论述不难看出，杨伟名对价值规律的作用——通过价格运动刺激、调节供求，通过供求反向变化又转而调节价格的作用认识得何等深刻！而且绝妙的是，杨伟名在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竟然乐观断言，只要放开市场搞活经济，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将来不但不会商品匮乏，而且会出现供大于求、产品滞销的现象，需要国家用保护价格收购以保护农民利益。4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农副产品难道不是需要国家以保护价收购吗？杨伟名真是料事如神啊！我们今天的“过剩”与杨伟名当年的“短缺”真是天上地下之别啊！所以，他担心人们会以他的断言为“乌托邦式的幻想”，假如他地下有知，看到我们今天市场的繁荣和农民销售难的“困境”，定会发出欣慰的大笑！

三是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探讨。这是一段因其思想的超前性令人惊叹不已的论述：“目前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国营经济及其领导下的集体、个体经济同时并存的局面。这里所要提及的两个问题：①当前国营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在当前形势下，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宜小不宜大，即便是仅占30%~40%，但也绝不会影响其对70%或60%的指导作用，就象一个人的体重100公斤，骨骼仅占30%或40%，但肌肉总是附着于骨骼，而为骨骼所支撑；并且肌肉故需要骨骼的支撑，而骨骼更需要肌肉的保护。就当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看，应该说不是骨骼支撑能力不足，倒是肌肉对骨骼的保护的作用不够，而所以致此，实由于肌肉十分瘠薄使然，于是我们应该把计划经济范围收缩到应有的限度，同时相应扩大非计划经济的范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尽可以放心，非计划经济的繁荣、壮

大，绝不会泛滥到足以影响国营计划经济的领导作用。”这里以骨骼与肌肉的关系比作国民经济中国有计划经济与集体、个体经济的市场经济的主导与主体的关系，十分生动形象，而且理论正确。尽管后面关于把计划经济缩小到城市范围，让农村经济放开以市场调节为主的设想与我们当今的现实相比仍有局限性，但要知道，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即使从 80 年代算起，也是几经反复啊！时而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时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时而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而是存在着商品经济的计划经济……直到十四大，才解决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直到十五大，才确认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模式。杨伟名 40 年前对计划与市场的分析，对公有（国营）与集体、个体经济比例结构的量化分析，难道还不精确吗？

杨伟名的代表作《当前形势情感》谈到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问题有四处：第一处是第四专题《腰带》，他以人体比喻国民经济整体，以腰带比喻国家的宏观计划调控机制。认为计划调控机制这根腰带要适度，且只能在缠在腰间（国民经济的要害部门即大型国营经济），而要放开手足（即放开中小工商业企业和农村的集市贸易，让市场机制去自由调节）人体才能气和神安，行动紧凑轻便，国民经济也才能调控有度运行灵活。这里，杨伟名已约略有了计划与市场皆是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机制，而非关涉社会性质的根本制度的认识，所以他才会把计划调控比作腰带，捆扎得松紧适度有利于国民经济整体的协调发展，过紧会使国民经济失去活力，过松会使国民经济活动“涣散无力”，形成不了一个有机体系，难道以聚强大的综合国力。

第二处在第二专题《“改造”与“节制”》中。他认为当时市场供应情况显得特别紧张，是由于对原来的资本主义性质工商品“改造”的面过广，把还不适于改造的中小型工商业都统统改造了，破坏了原有的生产关系——即原有的生产与流通、消费之间的正常渠道。而新的生产关系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尚未形成，从而出现工农业脱节现象，使以农副产品为原材料的工业萎缩，进一步减少了市场供应，导致供求失衡了。这里，杨伟名又一次提到生产关系这一经济范畴，但此处的生产关系不在分析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水平这一根本要求，而在于分析生产关系作为一组关系体系，由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四大环节组成，各个环节之间互相制约互相依存的关系。特别是他强调流通对生产的反作用。他认为正是不适时适度、脱离当时生产力水平的社会主义“改造”面过广，打破了原社会再生产过程生产关系四大环节的平衡，使流通与生产脱节，从而导致生产不足，进一步影响分配和消费。造成的直接社会现实就是长期的物资供应短缺，贫困与饥寒的阴影笼罩中国城乡。他所开的药方是用温和的“节制”（适度调控）代替“改造”，开放一块空间，让中小工商业在市场环境中得以恢复发展，并认为这与“恢复单干”给农业一条生路的道理是一样的。

第三处在第 9 专题《市场管理》中，他指出当时在国家统购垄断一类物资（粮、棉、油、肉）供应的严格控制下，仍然存在着一类物资的黑市交易，无论怎样的严刑峻法，也不能使它完全消失，甚至是黑市价格愈打愈高，风险与暴利并存。

只好成为公开的秘密，各地争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借助这种不合法的黑市交易聊补国家供应不足，度过春荒。这正是我们后来在改革开放初期所公开鼓动实行的“价格双轨制”，而在当时却以非法的黑市交易偷偷存在。杨伟名指出，既然“已成普遍存在的事实，并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和度过春荒的必要手段，那么“有关市场管理问题如钱、饭、蛋、肉、莲藕等自由交易，就无必要再加禁止”，在国家流通渠道远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借助自由交易的支援，共同满足群众的要求”。40 年后的青年面对着城乡农副产品市场琳琅满目的商品，鲜活活的蔬菜、鱼、肉，绝对不能理解杨伟名笔下的世界，觉得简直是“匪夷所思”的梦魇，然而 5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他们正是从那场梦魇中走过来的。

第四处在第 10 专题《烦琐的哲学》中，杨伟名介述当时在统购统销政策下国家对鸡蛋的收购价格过低，农户不愿交售，而采取层层派购并加粮食奖励的办法，听起来似乎是指令性计划加激励机制，挺不错的。但家家户户分摊交售的鸡蛋与兑现的粮、糖要细化为几两几钱，整个操作过程分为 10 道工序，——仅仅为了收购 18 斤鸡蛋！这一个实际发生的典型案例，讲给今天的年轻人听，简直是一则令人啼笑皆非的政治笑话，可这是历史的真实。杨伟名当时就向供销社建议，完全可以参照自由市场的鸡蛋价格收购鸡蛋简化手续收购鸡蛋，并以高收高售（包括奖励的糖、粮也商品化处理）的方法，防止赔本。他说：“这样以高对高，虽高何妨！”“关于以高对高的办法，其好处还不仅止何妨而已，内中还包含着通过价值法则，鼓励养鸡取蛋的积极作用。”

总之，杨伟名对市场、价格、价值规律、市场机制已有明确的认识，并试图探讨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他的论述虽欠系统性，但他的探索较 80 年代初期经济学界与政界的探索早了 20 年。

2.4 “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初步认识

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历史阶段的划分，经济学界的同仁均能从马克思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说，列宁的“共产主义阶段与社会主义阶段”论，及其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的划分学说”谈起，一直谈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会分析各经典大师“阶段划分”理论的差异与发展，尤其是关于“过渡阶段”理论的“大过渡”与“小过渡”等理论分歧。

这个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纯理论问题，但作为一种指导思想，反过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时，其所显示的威力就绝不是“力透纸背”的问题了。对自己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正确与否，足以影响一个时代治国政策体系的对错。中国和前苏联均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当年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赫鲁晓夫均先后以“小过渡”理论为依据，认为苏联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进入了社会主义，在 60 年代建成了社会主义开始向共产主义迈进，造成经济体制的高度计划集中、僵化，导致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亦是持“小过渡”理论，抛弃了在建国前夕形成的较为正确的在建国后会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的理论。不顾及生产力水平的现状，认为经过短短的 6 年“社会主义改造”就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导致了之后“三面红旗”等一系列极左错误的接踵而来。应该说对自己所处社会历史阶段的判断失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前 30 年最沉痛的历史教训。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首先思考“什么叫社会主义？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哪一阶段？这一阶段面临的基本矛盾、根本任务是什么？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系列关涉改革全局，决定中国命运的根本理论问题，也是根本的社会实践问题。终于在党的十三大、十四大报告中，相继完成了对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认识，形成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杨伟名以一个农民思想家的睿智和对社会基层生产力水平与现状的熟悉，他对中国当时处于什么历史阶段亦有自己的思考与回答。在《怀感》第七专题《“进”与“退”》中，他认为要解决当时的经济困难，就得效仿医生治病，分析病因，标本兼治，而且重在治本。他进一步分析当时困难产生的病因在于“走过五里的问题，因之克服困难的根本方法也就是后退够五里的问题了”。为什么会“走过五里”？就是不能正确认识所处的历史阶级、所面临的历史任务，过高地估计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人为地拔高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他说：“我自己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由 1949 年解放起到 1955 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 6 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

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有人曾经说过：我们社会主义建设要当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步没有走好，第二步怎么会走好呢？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背了客观规律”。杨伟名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他认为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到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之间，有两个小的历史阶段，各约为二三十年，一个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这一阶段的历史任务是“把一个具有 6 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在强调生产力的发展；第二阶段是“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对这一阶段的历史任务，杨伟名似乎重在强调制度变迁，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各种政治与经济制度，才算是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转化与改变。对于接之而来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历史任务，时间长短，他再未作预言。

在《怀感》全文的后记部分，他又对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任务，作了补充修正：“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有的同志谈：三座大山推倒，革命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任务就算完成了，从此以后，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了。我觉得这中间并不存在什么问题，就以第七节中所提的把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说成是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也是可以的。”这一解释与补充，是杨伟名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思想的一个重要飞跃。第一，党中央已经放弃了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的划分体系，并以此为据，认为中国 1956 年就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既然历史已经发生，不可逆转，再硬要坚持当时还处于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的观点，与现实（尤其是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亦相去甚远，难于为时人理解与接受。第二，明确表示，亦可以把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说成是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也就是说，承认以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政权确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开始，但生产力水平还十分低下，尚不能认为是成熟的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其第一历史任务仍然是发展生产力，完成本应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这一时期太短几乎不存在）完成的工业化任务，那么由于已认可了当时已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自然在前所述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就归并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中了”，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一方面要完成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一方面要不断自我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及在根本制度制约下的各种政治与经济体制。现在看来，杨伟名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思想与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有惊人的相似相通之处。第一，都是针对中国自己的特殊国情所作的对所处时代与历史阶段的判断，不强加于别国；第二，都是本着尊重历史与现实的态度，既认为中国在根本制度上已进入了社会主义，但又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尚达不到社会主义应达到的高度，所以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邓小平同志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初级（期）阶段的根本任务，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也应在实践中逐渐完善——这正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基石，杨伟名则认为是“长期转化的过程”。

当然，邓小平同志的初级阶段理论，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也是对建党建国几十年历史经验与沉痛教训所作的理性反思，它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包含着四个现代宏伟蓝图与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与时期安排，将整整影响一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包括中国共产党 21 世纪前半期的奋斗目标。而杨伟名的论述及他在一篇文章中思想前后的发展变化，就说明他确实在作初步探索，但这亦足以证明邓小平的初级阶段理论确实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其中就包含着杨伟名的前驱性思考。

2.5 孙中山经济思想对杨伟名的影响

杨伟名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历史的风雨飘摇时期，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与领袖人物的孙中山，他的思想整整影响两代人。尤其是孙中山晚年与时俱进，敢于坚持真理，

勇于修正错误，提出了“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相衔接，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基础。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有积极的经济内容，即“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以后发展为“耕者有其田”。孙中山对自己的“民生”主义自视很高，他说“什么叫民生主义？民生主义就是人民的生命，国家的生计，社会的生存，民众的生活。民生主义说到底就是共产主义，也叫社会主义即为大同主义”。列宁善意地批评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主观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但在当时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可以用来指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反封建的任务。

勤奋好学的杨伟名读过三四十年代宣扬民生主义的书，所以他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内容很熟悉，在《怀感》中多处引用。如在第七专题《进与退》中，在分析病因指出对社会阶段判断失误导致拔苗助长的错误和恶果之后，他说：“从上述情况看来，回答我们需要再退几里的问题是很简单的。”工商业政策方面，大体遵循孙中山先生“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有资本”的原则，农业方面按照集体、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的原则，“这是养鸡取蛋，有别于杀鸡取蛋，这是釜底抽薪，有别于扬汤止沸，这是治本之道，有别于治标之法，这就是我们要退的终点”。而在第六专题“恢复单干”中，主张“土地虽分到户，而地权仍归集体所有”，就学习运用了孙中山的平权地权思想——由集体掌握土地所有权方能调节土地的经营使用权。

孙中山经济思想的进步意义是世所公认的，让我们惊奇的是，它竟然能影响到中国西部穷乡僻壤中的杨伟名，由此可见杨伟名深厚的文化底蕴。

要言之，杨伟名的经济思想主要来源于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教育，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把握和运用这些理论武器解析当时社会经济实践后的思考，而中国古近代文化对他的熏陶，对他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理论的形成，更是不能低估的。即就是他的以死抗争，以死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的最后选择，也走的是走中国历代铮铮风骨式的知识分子与忠臣良相们走的共同路径。

伟哉，杨伟名先生！

On Yang Weiming's economic thought

Wei Wei

(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a We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Abstract: Yang Weiming is a great farmer thinker in HU County, Shanxi province. This text analyzed the thought of his economy from five aspects, and the conduct and actions pass away to him 35 anniversary of memorial.

Key words: : Yang Weiming; economic thought; County

收稿日期: 2003-04-15